

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十大显著标志

唐亚林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科学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回答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重大命题,可以从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的比较视角入手。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与实践、人民与政党、党员与党组织、一党长期执政与权力制约监督等关系方面,在坚持和继承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显著标志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民立场”和“自我革命”“两大显著标志说”。基于政治理想、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的有机结合,可以提炼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十大显著标志,即以人民解放为使命,中国共产党奉行共产主义的崇高政治理想;以人民利益为依归,中国共产党奉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理论创新为指引,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思想发动机;以先进性纯洁性为根本,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重视政治建设;以人民立场为方法,中国共产党奉行以人为本的政治价值观;以人民情怀为取向,中国共产党运用群众路线的情感方法;以人民监督为镜鉴,中国共产党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工作作风;以自我约束为手段,中国共产党践行自我革命的创新品格;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以贡献人生为职志,中国共产党弘扬自我奉献的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十大显著标志,可以汇结为一个根本公式——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成功之道的具体公式(“中国共产党公式”),可以概括为“先锋队组织+马克思主义理论+先进分子+政治家集团+铁的纪律+民主集中制+统一战线+自我革命等等等等++=总和=中国共产党”。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其他政党;区别;显著标志;公式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21.10.001

2021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文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该文献以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为主线,从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理念、实践和成就三大维度,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这一重大命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述,并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是一个为实现理想不懈奋斗的政党,是一个具有强大领导力和执政力的政党,是一个始终保持旺盛生机和活力的政党,是一个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的政党五个方面,系统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历史使命与伟大理想这一核心问题。⁽¹⁾

作者简介:唐亚林,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府与政治、比较政府与政治、城市治理与区域一体化发展。

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这一重大命题的回答,我们既可以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和行动价值来加以系统化论述,又可以从政党性质、政党功能与政党使命“三位一体”的复合角度来加以系统化阐释,^[2]从中提炼出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进而形成一个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新型理论分析范式,从而为政治学领域新型政党理论的范式创新提供全新的理论、历史与现实基础。

一、问题的提出:从比较中认清“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

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制度成为西欧等早发现代化国家的主导政治制度范式。通过三权分立与制衡制(实质上是两权分立与制衡制)、立法与司法审查制、公民自由权制、任期制、上诉与请愿权利制等五大支柱性的原初制度设计,^[3]英国率先建构了对公共权力进行制约、对公民权利进行维护的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体系,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维护私人财产权和个人自由的制度设计初衷。紧随其后并产生广泛影响的美式民主的支柱性原初制度设计,则主要包括保护私人财产权和个人自由的根本原则、建立在契约论基础之上的政府、建立在代表制责任制任期制基础之上的共和主义政府、实行分权制的有限政府以及拥有激进信念的精英共识五大内容。^[4]

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与流动性的不断加剧与相互强化,政党在一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重要,其根本性标志是以议会为中心的传统政治过程向以政府为中心的现代政治过程再向以政党为中心的当代政治过程的转换式演进,而从议会内不断分化出的不同派系组织与从议会外的社会团体和利益集团中成长起来的政治性组织相互合流,开始走向一种以夺取执政权、分配公共职位为目标的“有组织的联合体”,^[5]这种“有组织的联合体”就是现代政党。

与这种以夺取执政权、分配公共职位为目标,奉行功利主义原则,并在实践中不断模糊政党阶级属性和抛弃政党政治理想的现代资本主义政党所不同的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政党从一开始就把实现人类完全解放的伟大政治理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结合各国自己的国情,通过将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相结合的方式,在探索实现各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征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此同时,针对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历史主题,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还推进了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之间、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与其他类型国家的相关政党之间的交流互鉴进程,为推进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追溯社会主义政党的成长史,从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等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共产主义同盟——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同盟撰写的“党纲”《共产党宣言》正式发表,到1869年民族国家范围内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1871年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的成立,再到脱胎于1898年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并于1903年成立的布尔什维克党,以及由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于1917年创建的世界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成立,人类社会见证了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到历史运动再到制度建构的巨大飞跃过程。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标志着近现代中国发展史上一个全新的政治发展主体和新型政治领导力量的诞生。毛泽东同志曾经高度评价道:“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6]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运动再到制度的历史性跨越,共产党从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政治组织到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组织再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长期执政的执政党组织的历史性跨越,二者的结合推动了共产党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方式,将实现人类伟大解放的政治理想转化为生动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实践,从而开辟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新模式、新道路与新形态。

二、从毛泽东“三大显著标志说”到习近平“两大显著标志说”: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说”的内涵扩展

“我们今天怎样建设我们的党?要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试图回答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中,根据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历史任务,结合党从幼年幼稚阶段到成熟自信阶段的奋斗经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成功秘诀,先是于1939年提出了“三大法宝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⁷⁾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着于1945年提出了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三大显著标志说”,又被称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中国共产党“三大作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

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⁸⁾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然后于1949年又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区别于前人的“三件主要武器说”：“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⁹⁾

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征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在坚持和继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历史进程中所取得的根本经验的同时,继续强调了“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¹⁰⁾另一方面根据历史发展的经验和现实发展的需要,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两大显著标志说”。

一是“人民立场显著标志说”。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全党同志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使我们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¹¹⁾

习近平同志的“人民立场显著标志说”,从党和人民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宗旨和评价工作得失的标准等角度,将人民利益、人民立场、人民情怀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宗旨、发展目

标与社会基础有机地统一起来,构建了基于人民本位观的共产党执政论。

二是“勇于自我革命显著标志说”。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¹²⁾这一重要论断。习近平同志的“勇于自我革命显著标志说”,用历史经验和实践绩效旗帜鲜明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在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完全可以通过自我监督、自我革命的方式,实现对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与积极行使、公民权利的有效维护与责任担当、公共利益的有效分配与社会生产、公共精神的有效提升与共同进步之人类政治制度体系构建的“四公”目标体系。⁽¹³⁾毫无疑问,这属于人类政治发展史上关于政党执政理论的伟大建构,也是人类政治学发展史上关于政党理论的重大突破。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我们要通过行动回答‘窑洞之问’,练就中国共产党人自我净化的‘绝世武功’。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证明,我们党自我净化的机制是有效的,我们完全有能力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¹⁴⁾

对于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勇于自我革命显著标志说”,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有一个逐步深入理解和总结提炼的过程。首先,勇于自我革命,需要敢于直面改革过程中的各种问题。2015年5月5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中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共同把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¹⁵⁾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改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坚决冲破思想观念束缚,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坚决清除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¹⁶⁾

其次,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2017年2月13日,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才能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要兴党强党,就必须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只有努力在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中实现自身跨越,才能不断给党和人民事业注入生机活力。”⁽¹⁷⁾2017年10月18日,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再次强调,“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要“把党的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¹⁸⁾2020年1月8日,习近平同志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是我们党的显著特点和优势”,“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总是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勇于推动自我革命,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正视问题、克服缺点,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正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这样做,才能够在危难之际绝处逢生、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永远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¹⁹⁾

最后,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将“勇于自我革命”上升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两大显著标志”之一,并将“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勇于自我革命”的根本武器。“我们党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

断应对好自身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风险考验,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²⁰⁾

综上所述,针对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从理论与实践关系、人民与政党关系、党员与党组织关系、一党长期执政与权力制约监督关系等方面,在坚持和继承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显著标志说”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立场”和“勇于自我革命”的“两大显著标志说”,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科学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这一重大命题,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值得我们知识原理、知识范式与知识体系一体化视角进行进一步总结和提升。

三、政治理想、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的有机结合: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十大显著标志分析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在1981年提出了一个关于美国政治或曰美式民主的著名命题“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一直是美国政治的中心话题,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现象。”⁽²¹⁾这一警世恒言从反面告诉了人们需要将政党的政治理想、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三者有机结合,方能开辟出人类政治发展的新形态、新道路与新境界。而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百年的探索与奋斗,始终坚持将这三者有机结合,不仅开创了独立自主、富强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发展的新局面与新图景,而且将其自身锻造成为一个引领当代中国发展的坚强领导核心和确保世界和平发展的新型政治发展力量,型构了与世界上其他政党所不同的十大显著标志。

1. 显著标志之一:以人民解放为使命,中国共产党奉行共产主义的崇高政治理想

具有崇高的政治理想,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

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不仅拥有崇高的政治理想,而且拥有将崇高的政治理想转化为能动力型政治制度体系与高效发展型政治实践的强大能力,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的根本特质。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诞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大事变。马克思主义政党从一开始就将建立包括消灭私有制、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人类伟大解放等在内的“自由人联合体”远大目标,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既体现了崇高的使命担当精神,又展现了美好的未来社会发展图景,还塑造了根本的社会发展动力基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²²⁾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旗帜鲜明地把消灭社会阶级区分,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的政治理想,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²³⁾

“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²⁴⁾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要创造人民解放的历史条件和实现建立人类社会“自由人联合体”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需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而且需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差别的强大物质基础。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党首先需要将共产主义的崇高政治理想转化为一种伟大的政治信念和思想体系,作为指引国家和社会发展、人民行动和选择的根本价值指南;其次,需要将共产主义的崇高政治理想转化为一种伟大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制度,通过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有机结合,建立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和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最后,需要将共产主义的崇高政治理想转化为一种

伟大的美好社会和人类共同体,通过共同富裕的美好社会和共赢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在国内建立人人平等自由、富足文明的共同富裕社会,在国际上建立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目标的观照下,构建世界各国和地区以及人民平等对话与自由交往的公共平台,为人类社会最终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崇高政治理想而构筑共赢共享性公共平台与中间性过渡性的共同体社会。

毛泽东同志曾经对共产主义崇高政治理想所内蕴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二者有机统一的特质,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这也就是资产阶级顽固派为什么要那样叫嚣和要求‘收起’它的原因。其实,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²⁵⁾ 习近平同志针对人类社会从一国“共同富裕文明社会”向“自由人联合体”过渡的共赢共享性公共平台与中间性过渡性共同体的社会共同体建设问题,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战略。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²⁶⁾。

将伟大的政治信念和思想体系、伟大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制度、伟大的美好社会和人类共同体三者有机地统一于政党的崇高政治理想,是中国共产党所独有的政党特质,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2. 显著标志之二:以人民利益为依归,中国共产党奉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在于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始终以人民利益为依归,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奉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名篇里,对共产党的本质属性进行了高度概括和提炼。首先,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代表着无产阶级运动的整体利益。“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²⁷⁾

其次,共产党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政党。“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²⁸⁾“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²⁹⁾

最后,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由共产党建立的国家政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政权。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工人阶级建立的国家政权——公社——的性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

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³⁰⁾ 1891年,恩格斯在为纪念巴黎公社20周年并为《法兰西内战》所撰写的“导言”中,特别强调了巴黎公社的真正意义,⁽³¹⁾ 在于“打碎旧的国家政权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并“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可以通过普选的方式随时撤换自己的代表和官吏。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就将人民利益置于最高位置,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并将之贯穿到所建立的国家政权、所培养选拔的干部队伍和所从事的伟大事业之中。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首先是将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意志作为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最高指导原则。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警卫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强调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³²⁾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1954年制定通过的第一部宪法中充分展现了人民利益至上的根本宗旨,“这个宪法草案是我国人民利益和人民意志的产物,是我们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产物”,⁽³³⁾ 而且将人民利益作为人民代表大会与一切国家机关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价值追求,“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统一意志,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一切国家机关工作的出发点。因此,在这一切国家机关中,也就能够在民主的基础上形成人民的政治一致性。”⁽³⁴⁾

“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党的利益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利益的集中表现。”⁽³⁵⁾ 这种对中国共产党以人民

利益为依归,奉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高度概括,既突破了现代西方政党只是充当部分人和利益集团的代表并为之服务的窠臼,又突破了现代西方国家政党将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侵害公民权利和集体利益的泥淖,走出了一条共产党通过组织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用崇高的理想、科学的理论和严格的纪律武装自己、指导群众,领导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人类解放的伟大使命而奋斗的新路。⁽³⁶⁾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³⁷⁾ 这一关于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的最新提炼,将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中国人民的利益与中国的利益乃至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指引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和社会建设、推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根本价值指引。

3. 显著标志之三:以理论创新为指引,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思想发动机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³⁸⁾ 革命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指导与引领作用无比巨大。“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³⁹⁾ 由科学理论所指导和引领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以及由科学理论所提供的治国理政方略与策略,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成功有效地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代表未来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党更是引领时代和代表未来的政党。在人类社会进入“一球多制”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党更需要继续坚守自己的初心

使命 将美好的政治理想转化为生动的社会实践。对此,习近平同志进行了系统的阐释“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进步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40]

科学的理论从哪里来?只能从无产阶级政党所领导的革命实践中来,只能从马克思主义政党所领导的治国理政实践中来,只能从马克思主义政党所领导的人民追求美好生活而来。这其中的关键,取决于三大方面的因素: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有机结合,以理论创新为指引,创造与本国实际相符合的新型思想理论体系。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41]

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将新型思想理论体系运用到马克思主义政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全过程,通过不同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科学制定和有效执行,将马克思主义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有机结合,不断将

科学的理论转化为满足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实践成果。

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将新型思想理论体系应用到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组织体系之中,通过各级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的科学掌握与有机运用,形成带领群众有效地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武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具有政治实践的意义,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义,这个问题是要向群众说明,为了使自己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他们在最近的将来应当做些什么。”^[42]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实践中,一方面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通过高度的政党主体理性的发挥,有机把握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相继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论成果,而且通过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将不断实现的发展目标与不断累积的执政绩效有机结合,创造性地提供了治国理政、治世兴世的发展方略、发展政策与发展方案,进而让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思想发动机。

4. 显著标志之四:以先进性纯洁性为根本,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重视政治建设

先进性纯洁性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政党的根本属性,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立身之本。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其先进性纯洁性来自多方面因素的综合造就:首先,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自己的私利,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次,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阶级最革命最先进的代表,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推进社会变革的根本政治力量;第三,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有着科学的理论指导自己,有着崇高的政治理想和鲜明的政治纲领引领自己,始终代表

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第四,马克思主义政党通过加强民主集中制,始终注重加强组织建设,加强纪律建设,保持团结和统一;第五,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严格党员标准,加强党员修养,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保持党员的先锋战士品质;第六,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注重加强思想、作风与能力建设,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上述六大因素,综合造就了先进性纯洁性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在新时代,以先进性纯洁性为根本,需要旗帜鲜明地重视和加强政治建设。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的战略要求,认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⁴³⁾而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需要全党上下坚定政治信仰,严守政治纪律,严格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把思想和行动自觉地统一到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并通过各方面的辛勤工作,形成推进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整体合力。

重视和加强政治建设,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还需要通过“组织起来”,加强学习教育,在实践中不断锤炼党性,不断提升党的组织、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的政治领悟力、政治判断力、政治执行力。“组织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中介形式。”⁽⁴⁴⁾无产阶级要组织起来,要组织成为阶级,组织成为政党,组织成为意识形态,组织成为革命行动,组织夺取政权,组织治理国家政权,都离不开政治建设将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离不开坚定的政治信仰、科学的理论指导、严格的政治纪律等的综合作用,离不开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没有组织,就没有统一,就没有团结,就没有权威,也就没有了令行禁止,自然谈不上革命力、执政力、领导力和治理力。

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了《组织起来》的讲话,提出“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

一种方针”。⁽⁴⁵⁾通过“组织起来”,让广大党员忠实地履行党员义务,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与此同时,通过“组织起来”,把广大人民群众和各方力量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形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体合力,是重视和加强政治建设的有效途径。

5. 显著标志之五:以人民立场为方法,中国共产党奉行以人为本的政治价值观

以人为本,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与人民性有机统一的体现,既是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建立“自由人联合体”以实现人类伟大解放的发展目标的根本要义所在,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所在。

马克思主义从现实生活中的人出发,提出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彻底改变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将人视为“抽象物”的固有立场,⁽⁴⁶⁾也彻底改变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从抽象的平等自由观念出发,实质上只不过是维护“有产者”的平等与自由的发展目的,转而将现实的人作为推进社会发展的历史主体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根本目的来对待。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立场为方法,奉行以人为本的政治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首先,中国共产党视人民为历史的创造者,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性力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⁴⁷⁾“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⁴⁸⁾其次,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最后,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通过走群众路线,知民意、汇民智、集民力,把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锻造成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和鱼水关系。“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⁴⁹⁾“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

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⁵⁰⁾

6. 显著标志之六:以人民情怀为取向,中国共产党运用群众路线的情感方法

“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无论身居多高的职位,都必须牢记我们的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⁵¹⁾ 习近平同志的誓言和告诫,不仅道出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而且道出了将人民群众的冷暖始终挂在心头的人民情怀,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以人民情怀为取向,就需要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方针,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实现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的有效途径加以对待,虚心向群众学习,汲取群众身上的智慧,汇集群众发展国家、改造社会、改变命运、创造美好生活的历史合力。毛泽东同志把共产党员与群众相结合作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⁵²⁾ 习近平同志把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党发展壮大和党的事业成败的显著标志。“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我们党始终强调,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⁵³⁾

以人民情怀为取向,还需要我们在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同时,始终把群众当作自己的亲人看待,在办事、听取意见、协商问题、解决矛盾、作出决策、加强监督、推进发展等过程中,运用“以心换心”的思维、以情唤情的方式、以理服人的方法、以德报怨的境界、以情感人的气度,实施情感治理模式,以达到整个社会的人心民风得到教化熏陶、社会秩序得到安定保障、发展绩效得到有效提升的和睦和谐和合状态。⁽⁵⁴⁾

7. 显著标志之七:以人民监督为镜鉴,中国共产党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工作作风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以人民监督为镜鉴,中国共产党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工作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因为所处的位置不同、所掌握的信息不同、所思考的问题不同、所追求的利益不同等实际的制约,不同的人对待同样一件事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出现很大的纷争,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在革命队伍里,不同的人怀揣着不同的动机从事革命工作,在权力、利益和荣誉等面前容易失去正确的方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历史进程中会经常碰到的问题。在党内,在党员之间、在党组织之中,经常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秉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不断提升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提升精神修养境界,既是确保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必由之路,又是防止各项工作出现偏差乃至避免造成巨大损失的有效途径。

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⁵⁵⁾ 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要借鉴延安整风的经验,通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问题。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借鉴延安整风经验,明确提出‘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这4句话、12个字,概括起来就是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说起来简洁明了,但真正做到就不那么容易了。”⁽⁵⁶⁾

要开展好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一方面需要积极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通过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与批评,查找工作中的偏差,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汲取人民群众的智慧,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另一方面需要在党内尤其是在党员领导干部和党员之间、下级党组织和上级党组织之间,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通过同志间的善意批评、友好提醒、真诚帮助、积极改正等方式方法,既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又形成团结一致的工作氛围,从而把党和国家的工作建立在人民群众满意和党员干部舒心的优良的政治文化基础之上。

8. 显著标志之八:以自我约束为手段,中国共产党践行自我革命的创新品格

人类社会一直在探索建构蕴涵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与积极行使、公民权利的有效维护与责任担当、公共利益的有效分配与社会生产、公共精神的有效提升与共同进步“四公”目标体系的优良政治制度体系。⁽⁵⁷⁾到目前为止,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只是在“四公”目标体系的“前两公”目标上(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公民权利的有效维护),初步建构了一个相对于君主专制制度有进步的政治制度体系,并没有在“公共权力的积极行使”“公民权利的责任担当”以及“公共利益的有效分配和社会生产”“公共精神的有效提升与共同进步”等方面走出一条成功之路。

相反,中国共产党以自我约束为手段,通过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通过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初步实现了人

类政治制度构建的“四公”目标体系,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政党失去理想、党员缺乏党纪约束、政党丧失党内监督等情况下,只能通过外部约束方式,并靠所谓多党制中的“反对党”,靠定期公开竞争性选举中的民众投票选择等监督方式进行公共权力监督的崭新道路,开辟了人类社会通过自我监督与自我革命的方式,将党员修养和组织教育、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有机结合,建立政治制度体系的主体性、道德性与情感性,实现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为民为国为世的发展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正是从此意义上讲,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要“把党的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⁵⁸⁾

中国共产党以自我约束为手段,践行自我革命的创新品格,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了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丰富思想成果,“如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从严管党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党内监督,接受人民监督,不断纯洁党的思想、纯洁党的组织、纯洁党的作风、纯洁党的肌体,等等”。⁽⁵⁹⁾

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通过充分运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等自我约束与自我监督相结合的方式,构建起了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相适应的党内监督坚强有力、党内监督与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一体化配合的新型公共权力监督形态。这种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基本内容,一是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党内监督体系,二是形成科学管用的防错纠错机制体系,具体说来,主要包括“制度化安排、内省化提升、动态化调整与最高层救济力四大方面,并在此过程中通过包括交心谈心、谈话提醒、约谈函询、批评与自我批评、纪律教育以及民主生

生活会、巡视巡察、述职评议、事项报告、考察考核等多样化机制”，⁽⁶⁰⁾及时发现苗头、及时解决问题、及时排除风险，初步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庄严承诺。

9. 显著标志之九：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

民主集中制，既是共产党组织建立的根本原则，又是共产党实现对国家和社会有效领导的领导制度，还是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制度保障。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列宁针对布尔什维克在残酷的敌我斗争中所面临的复杂局势以及布尔什维克开展秘密工作的需要，一方面承认共产党是按照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党内一切事务通过一律平等的党员选举代表进行处置，另一方面强调为保证党纲问题上和策略问题上的一致性，就必须加强党内团结，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并加强组织上的统一。“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⁶¹⁾针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分裂党、破坏纪律的行为，毛泽东同志从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和发挥积极性双重视角，对民主集中制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其一，“（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其二，“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⁶²⁾后来，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把民主集中制的内涵概括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⁶³⁾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发挥远超其他政党的强大执政能力，除了如前所述有崇高的政治理想作指引、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有自我革命勇气作支撑等特质外，还与中国共产党始终将

立基“铁的纪律”的民主集中制贯穿于其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建设事业、改革事业等全过程，实现了革命力、领导力和执政力的有机结合，进而形成了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通过执政力统领领导力、革命力和治理力的“四力合力发展格局”。

在新时代，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首先需要在党内继续坚持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通过令行禁止的方式，自觉执行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将党的大政方针有效地转化为国家和社会的战略和政策，实现党内的高度团结统一以及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有效领导之目标。其次需要加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的榜样作用，通过各级党组织的模范带头作用，形成党内既团结紧张又生动活泼，既风清气正又关心爱护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态。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央政治局要继续在坚持民主集中制方面成为全党典范，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⁶⁴⁾最后需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广泛地汲取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大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门、大张清正廉洁之气，通过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开创中国共产党有效领导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发展新路。

10. 显著标志之十：以贡献人生为职志，中国共产党弘扬自我奉献的革命精神

中国共产党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这一形象比喻，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中国共产党崇高政治理想的感召和坚强成功的领导下，既具备坚不可摧的政治信仰和勇敢顽强的意志品质，又具备自觉自为的政治觉悟和随时奉献自己的高尚情操。在《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入党誓词中，就有“以贡献人生为职志，弘扬自我奉献精神”的内容。“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毛泽东同志1939年12月21日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号召全党同志学习白求恩的“毫

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这种精神表现为“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而且,“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⁶⁵⁾2019年3月22日,习近平同志在会见意大利众议长菲科时提到,“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⁶⁶⁾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这种“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这种以贡献人生为职志,弘扬自我奉献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要做到以贡献人生为职志,将自己有限的生命融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中去,需要不断加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修养,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党纪党规教育、群众观念确立、社会实践学习、工作能力提升、榜样示范作用、蜕化变质清除等多管齐下的方式,时刻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引领性。

加强党员修养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向先进人物先进典型学习的过程,是一个多方面修养综合提升的过程。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提出,共产党员“需要在无产阶级和一切群众的长期而伟大的革命斗争中进行各方面的修养,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要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等”⁽⁶⁷⁾刘少奇同志还认为,由于党员的政治觉悟、斗争经验、工作岗位、文化程度、社会活动的条件都各不相同,因此加强党员的修养或者注重修养的方面,会各有差别。也正是基于此种复杂的情况,在新

时代,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从严管党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党内监督,接受人民监督,不断纯洁党的思想、纯洁党的组织、纯洁党的作风、纯洁党的肌体”⁽⁶⁸⁾的根本要求。

中国共产党以贡献人生为职志,弘扬自我奉献的革命精神,是一种最高尚的政党精神,代表着共产党组织所追求的人类最伟大精神,它是将共产党组织的政治理想、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有机结合的最高体现,并展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朝着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伟大目标,乃至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实现人类伟大解放的远大目标的伟大事业洪流之中。

四、结语:一个新的“中国共产党公式”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成功之道

尽管通过上述十大显著标志的系统分析,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层次揭示,但对于现代政党所具有的诸如民意代表与表达、精英选拔与培养、社会动员与政治社会化等一般功能还是要予以合理承认并加以有机运用,以便让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使命和功能发挥得更好,并不断转化为生动的历史实践。

1918年春,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几个提纲》中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的著名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⁶⁹⁾列宁之所以提出这一关于社会主义的著名公式,其根本原因在于要苏维埃政权与广大人民学会工作,而学会工作的前提在于要学习诸如泰罗制等资本主义最新成就与一切进步的东西,因为泰罗制“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

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在此基础上,列宁甚至认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70]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所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71]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中国革命成功的一个根本公式,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其核心要义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的先进组织和领导力量,它是由先进理论引领、由先进部队和先进分子组成、由先进领导集团领导、由铁的纪律保障、由广大工人农民和一切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各类生产者等组成广泛统一战线的先进组织,这构成了作为一种政党组织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奥秘。

总结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十大显著标志,我们可以归结为一个根本公式——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领导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无往而不胜的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成功之道。而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成功之道的具体公式,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公式”,可以概括为:先锋队组织+马克思主义理论+先进分子+政治家集团+铁的纪律+民主集中制+统一战线+自我革命等等等等++=总和=中国共产党。

注释:

[1]《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人民日报》2021年8月27日。

[2] [36]唐亚林《使命型政党:新型政党理论分析范式创新与发展之道》,《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4期。

[3] [美]丹尼斯·朗《权力论》,陆震纶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4] [美]托马斯·戴伊等《民主的反讽:美国精英政治是如何运作的(第15版)》,林朝晖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年,第37-38页。

[5] R. M. Maclver,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396. 转引自(美)利昂·D. 爱泼斯坦《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何文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6页。

[6] [41]《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4、1515页。

[7]《〈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6页。

[8] [47] [55] [63]《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3-1096、1031、1096、1057页。

[9] [71]《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0页。

[10] [53]《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66-367页。

[11] [16] [49]《不忘初心,继续前进(2016年7月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0、39、40页。

[12] [20] [37]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13]唐亚林《中国式民主的内涵重构、话语叙事与发展方略——兼与高民政、蒋德海教授商榷》,《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6期。

[14]《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2018年1月1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511页。

[15]《勇于自我革命,当改革的促进派实干家(2015年5月5日—2017年8月29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04页。

[17]《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2月14日。

[18] [43] [58]《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0、48、48-49、20、48页。

[19]《持续推动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20年1月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541页。

[21] [美]塞缪尔·P·亨廷顿《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

现实之间》,先萌奇、景伟明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20年,第6-7页。

(22) [24] [27] [28] [29]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2、295、413、411、434、9-10页。

(23)《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页。

(25)《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6页。

(26)《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2017年12月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33页。

(30)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8-99页。

(32)《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4页。

(33) [34]《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5、159页。

(35) [67]《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4、108-109页。

(38) [61]《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1、499页。

(4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42) [70]《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0、492页。

(44)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01页。

(45) [52]《组织起来(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0、933页。

(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5页。

(48)《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2018年3月1日—

2019年12月27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35页。

(50)《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人民日报》2021年2月21日。

(51)《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2018年3月20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39页。

(54)唐亚林《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86页。

(56)《准确把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75页。

(57)唐亚林《党的领导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政治保证》,《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1年第7期。

(59) [68]《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2019年6月24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532页。

(60)唐亚林《“全过程民主”:运作形态与实现机制》,《江淮论坛》2021年第1期。

(62)《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8-529页。

(64)《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2016年12月26日—27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89页。

(65)《纪念白求恩(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9-660页。

(66)《我将无我,不负人民(2019年3月22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44页。

(69)《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20页。

(责任编辑:马立钊)